

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模式研究 ——以平武县关坝村为例

何海燕¹,李芯锐²,冯杰¹

(1. 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 100000;

2. 绵阳市平武县白熊谷乡村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四川 绵阳 622550)

摘要:社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利益主体之一,如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且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基于社区视角,以四川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村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模式为案例,分析了关坝村自然教育发展模式、主要做法和成效等,提出了提高社区组织管理能力、社区赋能、以资产为本的自然教育发展以及与大熊猫国家公园政策结合的建议。旨在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自然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自然教育;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22)03-0247-04

DOI:10.16663/j.cnki.lskj.2022.03.055

1 引言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大熊猫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区域,具有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同时兼具科研、教育、体验等综合功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中明确提出通过“合理设置岗位,安置原住民从事自然教育、生态体验以及辅助保护和监测等工作”^[1],实现自然保护与社区建设的共赢发展。自然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发展模式,有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感,是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2]。开展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是顺应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促进社区生计转型,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路径之一。

近年来,不少学者和基层实践者对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发展进行相关研究,李杰对大熊猫国家公园佛坪分局自然教育进行了分析,提出以科研转化促进自然教育发展^[3];冯科根据SWOT分析,梳理了长青保护区自然教育的对策建议^[4];张会文梳理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分局自然教育的方法、成效和思考^[5];刘俊分析了卧龙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的模式^[6];黄晓从规划设计的角度阐述了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的发展思路^[7];余孟韩提出自然教育对乡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8];唐艺掣从运营管理、场地设施、产品服务以及课

程教材等方面构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9],赵敏燕提出五位一体的自然教育功能的环境解说系统^[10],崔庆江通过实证分析提出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普遍缺乏“教育、游憩、社区参与功能”等功能^[11]。这些研究从保护区发展、设计规划、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等视角探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发展路径,但是缺乏社区视角,尤其是缺乏社区参与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发展的案例分析。为此,本文将基于社区视角,从关坝村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案例入手,分析模式、成效和总结建议,以期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提供参考。

2 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现状

2.1 原住民数量庞大,社区参与问题突出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 27134 km²,涉及 152 个乡镇 12.08 万人,有藏族、羌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侗族、瑶族等 19 个少数民族。原住民数量庞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社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难点和问题。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原有大熊猫保护区为基础,同时将国有林、集体林以及社区扩展进来,形成保护地和社区空间接壤重叠、资源相互交错、利益共享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相互影响的保护格局,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而言,社区是绕不开和离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社区居民和自然资源被统一视为管理对象,忽视了社区作为资源管理与利用的主体地位,导致社区参与动力不足、参与层次较低、参与态度消极、参与机制薄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

收稿日期:2021-08-13

作者简介:何海燕(1994—),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林业经济管理、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和社区发展。

通讯作者:冯杰(1982—),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和社区发展。

上影响了大猫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的原则和体制试点建设要求。

2.2 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突出,生计水平较低

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整体经济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其中包括平武县在内的15个县(区)是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相对贫困特征突出。长期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普遍形成了自然资源依赖的初级产业结构,传统种养殖收入是当地社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原始粗放型的资源利用方式突出,长期陷于区域性经济落后,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状态^[12],形成了一定的生态贫困困境。

2.3 生态价值实现程度较低,负外部性突出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中社区往往处于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重叠区域,当地自然资源丰富,但却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相关的保护政策虽然对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等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性,但是当地社区承担了保护的成本,影响了社区发展经济、利用自然资源的公平权利^[13]。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较高的生态价值没有得到有效转化,尤其是当地社区没有获得与之投入相匹配的生态产品收益^[14]。整体而言,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较低,仅停留在第一产业,规模较小,实现机制单一,获益人群有限。

3 区域概况

3.1 社区概况

关坝村位于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全村总面积 98 hm²,其中林业用地 3880.9 hm²,占总面积的 96.3%。该村原属于贫困村(已脱贫),辖 4 个村民小组共 121 户,分布有藏族、苗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中蜂养殖和核桃、药材种植是当地传统生计方式。在地理区位上,关坝村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处于大熊猫分布范围较广的岷山山系大熊猫 A 种群,是国家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中 35 个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域。根据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分析,在关坝村的生产生活区域内,大熊猫种群密度为 0.06~0.2 只/km²,属于中密度分布,预估沟内熊猫数量在 4~7 只左右,是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以及走廊带。

3.2 资源条件

关坝村自然生态环境较好、野生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羚牛、川金丝猴、金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獭、斑羚、黑熊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红豆杉和珙桐等。当地民族文化浓厚,具有白马藏族、白熊部落以及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同时长期的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以中蜂养殖

和庭院经济为主的传统农耕文化资源。2009 年关坝村成立森林巡护队,开始了社区自发性的生态保护工作;2018 年关坝村上线蚂蚁森林公益保护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公众吸引力。自然、文化、社会和社区等资源为关坝村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素材和天然的场所,是关坝自然教育发展的基础。

4 模式与做法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关坝村良好的资源优势 and 长期的社区保护行动转为高质量、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背景下,2018 年关坝村开始探索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探索保护与发展共生模式。

4.1 模式

目前,关坝村形成了“一核多元”的自然教育发展模式(图 1)。具体内容是:社区以合作社为自然教育管理运行的主体,基于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与自然教育行业机构以及社区农户开展合作,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合作社通过利益反哺和自然教育活动推动社区保护工作,保护中心结合巡护监测工作为自然教育提供活动内容、场地以及人员,在村内形成保护组织和发展组织之间相互支撑与内循环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支持,为社区自然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合作社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全村收益,促进社区发展。最终形成多个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且充分受益的格局,通过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模式,构建经济社会和生态保护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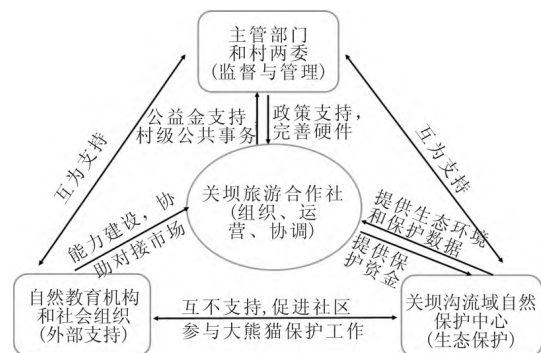


图 1 关坝村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模式

4.2 主要做法

4.2.1 调查规划

关坝村先后从产业发展需求、自然教育资源禀赋、社区接待能力、保护发展协调关系等多个方面出发,规划了《关坝保护小区生态产业及生态旅游概念方案》《四川平武县关坝村保护与发展指导原则与要求》,同时开展关坝村自然教育调查等,为关坝村自然

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2.2 组织构建

在关坝村“两委”的领导下,成立“平武县白熊谷乡村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组织载体。通过多次社区会议,由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旅游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和利益分配制度。由村民大会选举成立旅游合作社管理团队,在对外合作、后勤管理、能力培训等方面进行分工。合作社作为社区自组织之一,通过社区参与实现社区管理的主体性,这是社区发展自然教育的核心。

4.2.3 能力建设

在社会组织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针对社区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开展不同类型的能力建设。关坝村旅游合作社管理团队、接待户等多次外出考察学习管理经营、接待服务;关坝村巡护队员参与自然导赏培训,学习自然解说、课程设计和野外救助;关坝村村委考察学习社区参与和集体经济等内容。能力建设在开拓眼界、提高专业知识能力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2.4 课程设计

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自然教育课程是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关坝村自然教育课程开发最大化的利用了当地环境、资源、人力和现有场地等要素,整合了生态保护理念与当地文化、社会、产业等资源关系,尤其是围绕着生态保护主题的课程成为当地自然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这是在自然教育中体现并回应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的重要环节。

4.2.5 利益分配

通过合作社,自然教育收入在社区内部的分配包括基本收益、激励收益以及二次分配3个方面。直接参与自然教育活动的村民将获得相应的基本收入,同时根据参与者的反馈评估情况获得一定的经济激励。自然教育纯利润的20%用于全村普惠,50%用于合作社管理团队劳务,15%反哺给关坝保护中心用于保护工作,15%形成旅游合作社发展风险基金。社区利益分配体现大熊猫国家公园促进原住民参与和收益的重要目标,也是平衡社区保护与发展内生关系的重要手段。

5 成效分析

5.1 经济效益

自然教育在社区发展中作为一种产业类型,能够形成集餐饮、住宿、导赏、体验为一体的第三产业链,由于第三产业往往具有较大的乘数效益,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2018~2021年底,关坝村共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约18次,累计到关坝村参与自然教育活动的人数达500余人次,收入约24万元,全村约50余名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自然教育活动中,间接带

动当地5万元的蜂蜜、核桃、山野菜等农产品收益。社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涉及层面广泛、参与性强,能够带动更多社区多层次、多环节收益,有效促进了生计转型发展。

5.2 生态效益

关坝村基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自然教育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参与自然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益探索。自然教育本身带有生态保护的使命,是一种保护的手段。通过自然教育引导可以使参与者形成尊重自然且对社区负责任的行为^[15]。通过自然教育让85%的本地村民意识到优质的生态环境与较高的经济收入挂钩,增强社区的生态保护意识,2018~2021年关坝旅游合作社向保护中心反哺生态资金8350元,通过二次利益分配实现经济对保护的反哺,一定程度上激励了社区保护行为,森林巡护监测达450人次,极大的促进了社区保护工作。同时不少自然教育体验者也通过保护地文创设计、生态宣传、巡护监测以及人兽冲突圆桌会议等方式共同参与到关坝保护地自然保护问题的解决之中。

5.3 社会效益

自然教育要素众多、内涵丰富,是社区产业、文化、自然、人才、组织等各方面的集合,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通过自然教育,关坝村获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关注,将“三月三蜂王节”“白熊部落文化”等传统活动以民俗节庆的方式进行传承;全村共多名返乡青年进行合作社、保护中心等社区自组织建设;促进约30名社区妇女自发性成立关坝舞蹈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于社区自然教育活动;对外进行不低于200人次的活动宣传等等。通过自然教育构建起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志愿者、自然教育参与者等多利益相关群体共同支持的社会网络系统,促进社区社会长远发展。

6 总结与建议

社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主体之一,自然教育是尊重社区自然资源使用权的重要体现。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具有多重目标和效益,既可以实现社区的协调发展,也能服务于生态保护目标,它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形式促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转化,在协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现从自然资源到社会服务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机转化上具有独特优势。但同时,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依然面临着社区导赏能力不足、组织能力有限、市场参与不足、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导致社区自然教育发展缓慢,受益机会较少。因此,基于今后社区自然教育发展提出以下策略。

6.1 提高社区自然教育的组织管理能力

社区自然教育需要长期的能力建设和开放合作,

提高社区开展自然教育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建立可持续的社区自然教育管理模式和利益分配模式,放权给村级自然教育发展组织,让自组织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参与市场竞争增强活力;动员社区的广泛参与,识别社区内的巡护队员、手工艺人、耕作劳动者等,培育不同活动类型和组织管理的社区人才,实现社区赋能。积极加强与政府、学校、自然教育商业机构、社会组织等横向合作,构建多样化的自然教育发展模式,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

6.2 强化以资产为本的自然教育发展路径

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发展需要深度挖掘社区的资产和资本,以当地生态自然资源、历史遗迹、社区人力资源、人文风情为基础,不断形成具有社区特色的课程内容。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和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和定制化的自然教育产品,增加自然教育的体验环节和内容。在持续增加吸引力的同时延长社区环节参与的时间,实现收入的多样性,扩大社区受益人群。

6.3 促进社区自然教育与大熊猫国家公园政策相结合

自然教育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发展需要与社区协调发展、特许经营、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以及生态公益岗位等内容相结合,发挥国家公园、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社区治理、企业参与等多主体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将自然教育内化为地方和国家公园的发展内容之一,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机制,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这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的发展意义深远,这些也将在今后进一步地影响自然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R].北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0.
- [2]李铁英,陈明慧,李德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定位与模式构建[J].野生动物学报,2021,42(3):930~936.
- [3]李杰,李涛,彭阿柳,等.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工作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佛坪管理分局依托科研的自然教育为例[J].绿色科技,2020(23):268~270.
- [4]冯科,谢汉宾.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的SWOT分析[J].林业建设,2018(1):27~30.
- [5]张会文,刘兴明,杨文赟.自然教育成效与思考——以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白水江分局为例[J].甘肃林业,2021(5):19~21.
- [6]刘俊,邹晓艳,何廷美,等.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方法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9(2):235~236.
- [7]黄骁,王梦君,唐占奎.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教育和自然体验发展思路研究[J].林业建设,2020(2):13~16.
- [8]孟孟,林瑛.自然教育介入乡村建设的多个案例分析与思考[J].环境教育,2020(4):48~51.
- [9]唐艺,谭欣悦,代丽梅,等.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绿色科技,2021,23(5):250~253.
- [10]赵敏燕,董锁成,崔庆江.基于自然教育功能的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系统建设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3):97~100.
- [11]崔庆江,赵敏燕,唐甜甜,等.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感知研究[J].生态经济,2020,36(11):118~124,131.
- [12]张志忠,李伟,张明春,等.新时期大熊猫保护地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2018(5):1~7.
- [13]高建中,唐根侠.论森林生态产品的外在性[J].生态经济,2007(2):109~112.
- [14]张丛林,车晓旭,郑诗豪,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J].国土资源情报,2020(6):15~19.
- [15]李碧莹,李怀瑜,昌宇玺,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社区的乡村振兴策略研究[J].城乡建设与发展,2020(5):291~292.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ommunity-led Nature Education in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Taking Guanba Village in Pingwu County as an Example

He Haiyan¹, Li Xinrui², Feng Jie¹

(1. Haidian District Shan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0, China; 2. Baixionggu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in Pingwu County, Mianyang, Sichuan 622550,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stakeholder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How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ommunity perspective and taking the community-led na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Guanba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modes, main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of natural education in Guanba villag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community empowerment, asset-based na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policy,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na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in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Key words: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nature educa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